

名家手稿提善工作述略

李小文

提善工作是 2006 至 2007 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重要工作，善本部和善本组一直高度重视并具体实施落实，目前工作已告一段落。现仅就名家手稿的提善做一简述。

一、提善工作的背景、作用和意义

1. 名家手稿面临的现状

名家手稿因具有研究与收藏的双重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手稿是名家一字一句亲笔手书的孤本、珍本特藏品，这不仅因为前辈名家的手稿已随他们的故去“不可再生”，还由于电脑写作的普及使现代名家的文稿变得日见稀少，因而手稿的市场价格持续走高。而我馆普通古籍藏书数量巨大，其中不少手稿类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当属善本予以保藏。2006 年馆领导部署提善工作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机缘的。虽然之前名家手稿也有一些是“中采组转”或“线装组转”来的，但像这次这样大规模提善尚无前例。名家手稿提善作为提善工作的一部分，机会难得。

2. 馆藏手稿类文献得以整合

提善的决策是顺应当前善本古籍手稿等特藏所面临的形势及馆里的实际状况而做出的，

这项工作使馆藏手稿得以科学调整，完成此类文献的梳理整合。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使一些在善本部和普通古籍两处都有的名家手稿，通过提善得以集中，有利于手稿的保存保护和查询。如朱希祖手稿在名家手稿文库有 35 种，在古籍馆有 9 种，朱氏日记在善本有 2 种，在普通古籍有 2 种，前几年朱家后人查看其手稿要跑两处地方；前馆长马叙伦手稿在善本有 20 种，在普通古籍有 4 种；邓广铭手稿在善本有 3 种，在普通古籍有 1 种，为其重要著作《岳飞的生平》；考古学家郭宝钧手稿在善本有 2 种，为《古玉新论》和《中国古代的铜器艺术》（高君箴赠），在普通古籍有 1 种《中国古器物学大纲——铜器篇》，几乎就是前者的姊妹篇；还有文革前入藏的徐志摩日记等手稿藏在名家手稿库，而陆小曼抄录的徐志摩日记则入藏在普通古籍库，二者是一起来馆的吗？为什么会分置两处呢？若不是有研究徐、陆的学者向我们提供信息，我们还不清楚这两个人手稿会有这样的分割。著名水利科学家郑肇经先生的代表作《中国水利史》和《河工学》两部手稿，也是分别收藏在名家手稿库和普通古籍组。事实上，两边都有的名家手稿还有林纾、缪荃孙、柳亚子、樊增祥、邵章、王文焘、徐蔚南、吴晗、钱玄同等；从目录中得知，樊增祥、梁鼎芬、缪荃孙、张之洞、黄彭年、张佩纶、陈宝箴、梁启超等人的书札也是两边都有，现将这些名家的手稿合在一处，实在是做珠联璧合的功德。

3. 珍稀文献集中保护意义深远

普通古籍组收藏的手稿有许多非常珍贵，应该说是难见稀有、高价难求，数量多而质量有保证。经过时间的淘洗，一些不被重视的民国稿本变成了有价值的文物，一些多年来被淡忘的民国学者、有争议的文人及形形色色的民国人物近年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使得这些人和这一时期的手稿格外引人注目。感谢普通古籍组的同事几十年来眼光独到的征集采访，积累入藏，几代前辈整理编目，使我们拥有这样一批宝贝，为提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手稿提善会极大提升这些稿本的价值，并利用善本库房一流的保护条件和严格的管理措施对其进行妥善的保藏，使这些珍品焕发光彩，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二、提善丰富了名家手稿的收藏

1. 名人范围的扩大

由于历史原因，以前不能收入名家文库的，属于“历史人物”这类的手稿墨迹，现在可以不必有顾虑地收进来，如袁世凯、周作人、叶德辉、王揖唐、王克敏、桥川时雄等；这些人虽然有污点，有争议，但其事迹却

甚为罕见。如周作人的手稿，民间就很少能见到。据熟悉他的老编辑周劭回忆，他是作家中最特别的一个，他的文稿是事先约定，原稿用毕，无论破损到任何地步，必须寄还。可见他十分珍爱自己的手稿。这次提善竟然发现周作人的《风雨谈瓜豆集》、《往昔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三种手稿，使人非常渴望知道它们是怎么到图书馆来的。都说周作人的文房用品样样讲究，从手稿中确可看到是传说中特别印制的“煨药庐”稿纸，加上一笔不苟的真书小楷，其手稿果然可说是风雅漂亮的文物。

藏书家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直山，一号郎园，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撰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曾以中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书籍史《书林清话》闻名。叶氏1927年就被处死了，80年后还能见到他的手稿《叶氏观古堂藏书目》，也可算是奇迹了。

2005年，善本部曾花不少钱购买日本人桥川时雄与他人的信札，提善中我们发现了他用中文撰写的《楚辞王注校正》、《略庵初稿》和《六朝文学的变迁考》三种稿本。

这些人物名头虽然很大，但在以前其手稿是断不能收入名家手稿文库的。直到现在，冯宝琳先生每次见面或打电话还都嘱咐我一定不要收有问题的人的手稿，（我也至今不敢告诉冯先生我收了这些人的手稿）可见当年手稿收藏的政治标准是相当严格的。

2. 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手稿的增加

此次提善发现多种以前不在征集范围的文化名人如伦明、王树楠、李慈铭、邵章、冯汝玠、红豆馆主等人的文稿诗稿，其中不少为代表作。

伦明（1872—1942），字哲如，又字喆儒，广东东莞县人。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师范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广东省立图书馆副馆长等职。伦氏藏书至富，约有四百余箱，分贮于北京、广州两地。“七七”事变后，伦氏南返隐居故乡，致力于校勘群书。1942年伦氏过世后，将广州藏书全部让于广东省图书馆。北京所藏部分于1947年全部归北京图书馆。此次发现伦氏重要文章及著作都有其手稿本，如：《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原孔》、《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续书楼读书记》、《清史谈屑》等，共十多种。对于了解民国时期续修四库全书等文化事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冯汝玠是民国时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字学家，致力于金石学、甲骨文、文字学、目录学，现在这个名字已经被人遗忘了。这次收到了他的文字学著作手稿《竹简遗文》、《文字形义总元》、《文字解析》，还有他的日记3册（1915-1917年）及他的自叙年谱，对于了解他的学术著作以及他的生平事迹都非常有价值。

红豆馆主（1871-1952）即爱新觉罗·溥侗，字后斋（一作厚斋），晚清贵族，号西园。红豆馆主天赋甚高，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能书善画，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还精于文物赏鉴，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朱家潘《故宫退食录》中有专章“记溥西园先生”，回忆溥侗先生多才多艺及其公子风格，这次发现他的诗稿《红豆馆吟草》和《韵秋草》2种，果然字体精雅，飘逸娟秀。

3. 发现罕见而珍贵的学者手稿

此次提善中发现不少民国时期很著名而后来渐被湮没的学者手稿，如李详、萧一山、胡文楷、废名、吴承仕等。

李详（1859-1931），字审言，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国学大师、扬州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曾主持纂修《兴化县志》。以博雅通识著称，著作颇丰，藏书丰富。又以骈文知名于世，笺注考证、金石、目录、方志、诗赋无所不精，成就卓著。李氏的稿本《世说新语笺释》《学制斋诗集》、《学制斋文集》《学制斋骈文续集》、《杜诗释义》、《陶集说略》等共13种藏于分馆。

萧一山（1902-1978），江苏铜山人，原名桂森，号非宇，字一山。19岁考入北京大学，受教于梁启超，得窥治学门径，立志以新方法为中国史学开拓新境界。上中学时就感到风行一时的日本人稻叶君山编写的《清朝全史》“观点纒纒，疏舛颇多”，并以国史假手外人为耻。上大学时他开始撰写《清代通史》。出版时梁启超、李

大钊、朱希祖诸前辈及日本今西龙博士等亲为之序，后续成中卷，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今发现萧一山手稿《国学根底书目》1册。萧氏1948年冬携眷赴台，1978年病逝于台北。今存之手稿可以说是保藏于大陆非常珍贵的手迹了。

胡文楷，以《历代妇女著作考》名世，而他个人的资料却很难查到。这次发现他的《昆山胡氏怀琴堂藏闺秀书目》手稿1册，实在是研究妇女史学者们的佳音。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小说家。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解放后他的名字渐被淡忘，十年浩劫期间遭受迫害，在孤寂中辞世。近年来随着对新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废名的著作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其作品选集被多家出版社出版。这次居然发现他的代表作《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册，确实出乎意料。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人，1915年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在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时，笔录太炎先生绪论，成《蕝汉微言》，名动天下，后成为我国著名经学家。1936年，吴先生于国势日趋危殆时加入了共产党。1937年北平沦陷后十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到天津，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8月，天津水灾，吴先生染患伤寒，后病情严重，秘密潜回北平。终因延误治疗抢救无效于9月21日逝世。吴先生之死，全国误传其为日寇杀害，举国震动。延安也开了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均致挽联。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章太炎先生曾把他的五位得意弟子戏封为“五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这五人在他们各自研究的领域中，均是大师级的人物，这次提善的手稿就有朱希祖、钱玄同和吴承仕的，前者是集中，后者是补缺（《说文解字篆文》1册）。这样，“五王”中除了汪东，其他四位连同他们老师的手稿就都集中在名家手稿库了，加上周氏兄弟以及马衡、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等人的手稿书札，章门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有了。一个世纪过去了，师生以这种方式又聚在一起。

4. 扩展了手稿的类型

此次手稿提善除了书稿、文稿、诗稿、笔记外，还有非常珍贵的名人日记和墨宝。日记是名家手稿中最难征集的文献，因为日记是最私人化的写作，内中记录许多私人活动和个人感受，不会轻易示人。分馆的稿本中有一些日记，也影印出版过，然名家的不多，可我们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些重要人物的日记，如燕京大学校长吴震春日记8册。

吴震春（1869—1944），字雷川，杭州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光绪二十四年进士。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他与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等人一道组成专门委员会，促成了燕京大学的诞生。1929年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吴雷川移居北京城内的“杭州会馆”，拒绝出任日伪职务。后将个人藏书全部捐赠给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并移居馆内，以抄书为生，清苦自持。直到1944年10月去世。这几册日记的年代是光绪二十一至三十二年。

在普通古籍中尚有刘半农、俞平伯、沈复墨迹，袁大总统墨宝等多位名家手迹及书法作品，这在以前的收藏中十分罕见。联想到这些人的手迹墨宝在拍卖市场的价格，会更加理解提善工作的重要和必要，认识它的意义和价值。

三、手稿提善的收获和体会

1. 业务学习和实践的好机会

过去说到采访工作，一般就是指采购，而此次提善才是真正以访书、寻书为主的特殊形式的手稿采访，是业务学习和实践的难得机会。通过这次实践，使我们不仅熟悉馆藏，认识名家，还认识了不少以前没听说过的馆内前辈。

谭新嘉是近代图书馆界的元老级人物。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国近代最早的图书馆——嘉郡（今嘉兴

市)图书馆建立,发起人公举谭新嘉“董理馆务兼编目员”。之后,他又被天津直隶图书馆馆长傅增湘请去编目,编成书目32卷。民国元年,他“应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约入都。”从民国初年至抗战前,谭新嘉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曾经和陈垣先生一起核对文津阁《四库全书》卷数。他的手稿《梦怀录》是其自叙年谱,记载了不少关于图书馆的大事小情,遗憾的是只记录到民国十八年。有关图书馆的内容曾被李希泌先生整理辑出刊于《文献》杂志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2004年嘉兴图书馆搞百年馆庆,没有找到谭氏手迹,甚感遗憾!

有一部李耀南著《中国书装源流》稿本,内容与图书馆有关,但其著者在工具书和网上都查不到。后来在查阅张秀民档案时意外发现李耀南原来也是北平图书馆的老先生,民国十八年编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录》记载:“李耀南 照亭 四十五岁 河南上蔡”,是善本部考订组组长,组长为赵万里。又一日,在善本部修整组的宣传展板上突然发现李耀南的名字及照片(其实那展览已展出好久了),原来他是修整组的前辈。这部手稿写于1943年,应是他多年工作的积累。

在提善中还意外发现两位前馆长的手稿:《傅治乡札记手稿》和《成多禄张朝墉诗稿》。

傅岳棻(1878-1951),字治乡,号娟净,湖北武昌人。清光绪举人。历任山西抚署文案,山西大学堂教务长及代理监督,京师学部总务司司长,曾于1919.1-1921.5,1924.4-1924.10两度担任我们馆的馆长。

成多禄(1864-1928),字竹山,号澹堪。隶汉军正黄旗。先后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幕主文案。1927年被任为教育部审核处处长兼图书馆副馆长。以诗歌、书法见重于世,被视为东北四大书圣之一。

馆内前辈的手稿一直是在我们征集的范围,以上各位的手稿对我们研究了解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 扩大知识面,避免让自己的知识盲点影响手稿的征集入藏

一个人总会有其不熟悉的领域和不知道不熟悉的名家。因此,越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越是要更加注意其稿本的著者。知道自己的不足,最可行的补救方法就是对每个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名字逐一查询,充分利用工具书、网络,绝大多数都会有收获,有时还有惊人的发现。目录上看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稿本1册,由于我馆收藏经济学家的手稿较少,故格外关注。著者秦柳方(1906-2007),没听说过,一查可不得了,原来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三、四十年代就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有论述,而我们看到的这部手稿正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在我们见到这部60年多前的手稿时,这位100岁的作者还健在呢。

自然科学是我们不甚熟悉的领域,需要特别关注。在“科”字头目录中发现1册《竹谱》稿本,著录为(南朝宋)戴凯之撰 岑铭恕校注 民国20年(1931)。岑铭恕这名字较陌生,一查,原来是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岑仲勉(1885-1961)原名汝懋,号铭恕。顺德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史地学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著作甚丰,手稿库中有他的论文手稿十余种,现在又可加一种了。

3 面临的新问题

名家手稿提善共计178种448册(件),极大地丰富了名家手稿文库的收藏。由于普通古籍组正在做书札项目,经上级领导批准,名人书札暂时不提。

此次提善增加了许多非常珍贵而有价值的名家手稿,但这些珍稀文献的来源、入藏时间、收藏背景却还都像谜一样,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文献的相关信息:这么珍贵的东西是怎么来的?何时来的?为什么同一个名家的手稿会善本有几种,普通古籍又有几种?这背后的真相或许就是我们今后研究的课题。

此外,提善中虽然有些品相不好的手稿被我们放弃了,但仍有一些散破的珍贵手稿让我们难以割舍,如历史学家周谷城的手稿《世界通史》和岑家梧的手稿《史前史概论》,故我们十分渴望名家手稿的修复也尽快列入修复计划中,希望得到领导的重视。